

人口流迁

新形势下我国乡—城迁移流持续原因新探

周 皓

【内容摘要】 文章在描述当前我国乡—城人口迁移及失业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城镇具有较高失业率这一新情况下,乡—城人口迁移流持续的原因,并运用西方的三种人口迁移理论对此作了定性的解释,认为在注意西方人口迁移模型的参数适用性的同时,应更多地从文化(观念)角度来对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进行剖析。

【作者简介】 周皓,1972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97级博士生。

1 引言

在我国,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迁移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但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而言,当前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性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增强的。因此,在社会背景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重新分析乡—城迁移流持续的原因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我国迁移人口的定义是根据户籍所在地发生变化而确定的,一般是指跨越一定行政界限、且户籍所在地发生改变的人口。如果户籍所在地未发生改变、仅改变了居住地的人口都属于流动人口,而不论他们在迁入地居住多长时间。但在近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或调查中,可以发现人口迁移的定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在跨越了一定的行政界限之后,如果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超过了规定时间的人口都属于迁移人口。这里的时间界限可以是半年(如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定义),也可以是一年(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的定义)。从而出现了永久性迁移人口与暂时性迁移人口之分。可以说由于这种迁移人口的定义包含了部分原先属于流动人口定义中的人,而已将迁移人口定义的内涵扩大了。可见我国的人口学界在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的定义上仍处于一种混乱状况。但由于这并不是本文所主要阐述的问题,因此本文对此不予评述。

本文中的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定义仍根据户籍所在地是否改变来确定。考虑到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为方便起见,在文中的某些地方将把所有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与流动人口统称为乡—城人口迁移流。

2 我国乡—城人口迁移流状况、形成机制及持续的原因

2.1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迁移与流动人口的变动状况

许多文献已对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变化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马侠,1994;冀党生,1995等)。总的来说,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特别是乡—城迁移流,正不断地增强。

1986年74城镇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迁移率约为5.7%,其中乡—城迁移人口在全部迁移人口中占50.6%(马侠,1994)。根据1990年普查资料,在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之间的五年中,我国的人口迁移率约为6.2%,其中乡—城迁移人口占全部迁移量的49.04%。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在1990年到7月1日到1995年6月30日之间的五年间,我国人口迁移率约为6.03%,其

中乡—城迁移人口占全部迁移量的 59.75%，比 1990 年普查数据高出 10 个百分点（10.71%）。

据估计，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的全国流动人口的变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1989 年之间的第一阶段中，迁移与流动人口逐年增加，于 1989 年达到约 7 000 万的高峰；但自 1989 年国家实行治理整顿之后到 1993 年的第二阶段中，迁移与流动人口迅速减少，大约仅为 3 500 万左右；随后，自 1993 年之后，流动人口才逐步增加，由 1993 年的 6 450 万（或 7 000 万）增加到 1995 年与 1996 年的 8 000 万到 8 200 万。显然，增加幅度并不是很大。（李荣时，1996（a）；李荣时，1996（b）；陈浩，1996；郭书田，1995）到 2000 年，流动人口很可能增加一倍而达到 1.5 亿左右（李荣时，1996（a））。

根据 1995 年的农业部《“民工潮”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目前已有的流动人口，有 27.8% 停留在特大城市中，而 45.1% 停留在中小城市中；即有 72.9% 的人停留在城市中。这也就是说，这些流动人口的目的地都较为集中。

2.2 农村及城市人口的就业状况

在这部分迁移与流动人口的背面，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部分人口的就业状况。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数。1995 年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估计数是 1.2—1.3 亿人（贾绍凤等，1996）。“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总量估计将达 2.4 亿人，预计仅能安置 7 700 万人就业，将尚有 1.3 亿人要失业（程唏，1997）。2000 年我国预测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 3 亿。

（2）城镇失业人口的估计数。定义城镇失业人口较为复杂。按国家统计局口径中有关失业人口的定义，它包括从未就过业的人口（即通常所说的“待业”人口），城市中的下岗职工以及真正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员这三部分人口。我们可以将这三部分人口称为“显性失业人口”。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转型时期随着国家及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机关及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将被逐步推向市场，从而可能成为失业人口；尽管已经有部分人口已处于失业状态，但本文仍将他们称为“隐性失业人口”。因此本文中的失业人口将包括以上四种、两类（即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人口。尽管本文中的城镇失业人口的比例将会比国家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率（即显性失业率）要高，但包括了隐性失业人口的失业率才真正能够代表我国目前失业水平。

我国城镇的公开失业率，由 1990 年 2.5% 上升到 1995 年的 2.9%；据预测，到 2000 年将升到 3.2%（贾绍凤，1996）。

在 80 年代初，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就已达 3 000 万人（程唏，1997），占当时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 28%；据贾绍凤等的估计，1995 年我国城镇隐性失业人口达 2 000 万，其中 500 万人是在国家机关，1 500 万在国有企业中，按照 1995 年我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为 2.346 亿人来计算（贾绍凤，1996），目前我国的隐性失业率高达 8.21%。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将不断显性化。据 1998 年 1 月 7 日国际广播电台午间新闻报道：仅 1997 年一年中，我国由于城市企业体制改革而下岗的城市职工数约为 1 100 万左右（约占当年全部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 4.5%）。预计 1998 年仍将有 1 100 万左右的职工下岗。

将上述显性数据与隐性数据两部分相加可以得知，按照本文中的失业统计口径计算，我国的失业率应在 10% 以上。

2.3 乡—城迁移的动机及迁移流持续的原因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乡—城人口迁移流在新的形势下仍能持续呢？其实，它包括了两个方面：（1）为什么面对我国城市中较高的失业率（不论是显性失业，还是隐性失业），农村人口仍继续迁往城市？（2）为什么我国城市尽管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却仍能吸纳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不论从宏观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微观的经济收益角度来看；不论从农村角度来看，还是从城市角度来看，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都存在着它的必然性。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乡—城迁移有其客观必然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必将逐步提高。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兄弟，它是以工业化为基础而得以发展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发生不断的转变，城镇中的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从而要求农

业人口逐步进入非农产业；这种必然性在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得到了证明。但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同于其它国家之处：即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村劳动力的需要并不是发生在城市劳动力短缺、从而需要输入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而是在城市就业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农村人口就已大量涌入城镇。运用泽林斯基对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标准来看，我国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因此，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今后的乡—城迁移流的持续仍将是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如果说政策的改变（指联产承包责任制及粮油副食品供应制度的改革）是八十年代乡—城迁移的前提条件，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是形成乡城迁移的根本原因，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是行移流形成的动机，而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劳动力报酬的提高形成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强大吸引力（冀党生，1995）；那么，在目前这股迁移流持续了近二十年之后，刺激着农村人口依然不断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应该说，仍然是这四个方面的，特别是产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因此从农村的角度来考虑，乡—城迁移也存在着它的必然性。

尽管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来说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但如果城市缺乏吸收能力的话，这种必然性也不可能转化成实际行为。换句话说，在较高的城镇失业率（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下，由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就业上如果与城镇人口存在着竞争性的话，一方面由于迁入者本身的文化素质等方面限制了迁入者在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城镇人口在各种信息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处于优势，使迁入者很难有机会在迁入地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我国的乡—城迁移人口与城镇职工之间在职业上，至少在短期内并不会表现出非常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则是互补性。原因如下：

2.3.1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这两种现象在发生时间上的差异性。乡—城人口迁移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城镇职工的逐步下岗则仅仅开始于1997年。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差异使乡—城迁移人口在城镇中就业的稳固性得到了加强。上文已提到了乡—城迁移的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三个阶段，即自1993年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是处于逐步的稳定低增长状态。这说明乡—城迁移与流动人口在经历了经济浪潮的冲击之后，已逐步开始了理性地选择迁移与流动了。而这种理性是建筑在对城镇经济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的；同时它更反映了乡—城迁移人口在城镇中的就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与保障。第一，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部分人口，即改革开放不久就已迁入或流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中居住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迁移定义中的时间界限，但由于受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森严的户籍制度等），使他们未能被列入城镇人口的行列，而仅仅只能被作为迁入或流入人口来对待。但他们却有着较深厚的职业基础，且这种职业基础的稳定性到现在仍然随着他们在城镇中居住时间的加长而逐步提高。这也就是说，迁入或流入城镇的多数人口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奋斗，已在城镇的就业岗位上一席之地，这部分乡—城迁移人口的就业并非很容易地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乡—城迁移流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即原先外出的部分人口回乡后不再外出，而被其他人所替代），但现阶段乡—城迁移人口量的增加状况又正好反映了替代者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化及在城镇中就业的稳定性得到增强。尽管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受到冲击，但这部分替代人口在城镇中就业的稳定性，应该说最主要的是得益于被替代人口城镇中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原先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比后来者在近期创造的就业基础来得更为坚实。因此在短时间内，由于职业基础的原因，两者仍处于相互补充的阶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乡—城迁移人口与城镇职工在职业上的竞争性可能会逐步显示出来。

2.3.2 职业观念与就业结构不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属于传统部门，如修理、低层的餐饮等，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移民职业”。尽管城镇人口对这些行业存在着较大的需求，但对从事这些活动的职业却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因而，即使他们在失业的情况下，一方面并非十分愿意去从事这类职业；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下岗职工在各种条件上要比由农村来的人强得多，但在城镇下岗潮中受冲击最大的是“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活在改革时期”的四五十岁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所具有的素质非但并不一定足以达到现代二、三产业的要求，而且由于长期受国家政策保护的影响，对于下

岗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换言之,就是乡—城迁移人口与城市劳动力在职业观念与就业结构上的差异使两部分人口的就业形成了互补的关系(蔡昉,1997)。

2.3.3 对职业的预期收入(比较利益)存在着差异。尽管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职业等级来看属于较低层次,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城镇人口而言也可能稍微低些;但这些收入已绝对高于他们在农村中所得到的收入。但对城镇人口而言,由于习惯于城镇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对于移民职业的收入可能不屑一顾。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镇人口享受着农村人口无法得到的各类社会福利保障,从而使他们即使在失业的情况下并不用十分担心生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城镇失业人口的类型: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及周期性失业;或者是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在部分城镇失业人口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较大部分的自愿性失业。他们等待着更好的就业机会与职业。那么,对这部分人而言,不管有多少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都不可能产生在职业上的竞争。

2.3.4 使迁移流得以持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迁移过程中的中介组织。不论是迁出地的政府或民间组织,还是迁入地的迁移中介组织,都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同时,已迁入城市中的外来者为后来者在信息、生活保障等方面提供了方便与条件,并在迁入地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及人缘为纽带的务工群体(陈浩,1996),乃至于一地域的群体观念,甚至可以称之为“移民文化”。

3 三种西方迁移理论对我国目前乡—城迁移流的解释能力

针对我国当前乡—城迁移状况,能否套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对此作出解释呢?

西方迁移理论一般可以分成四类:宏观非经济学迁移理论,宏观经济学迁移理论,微观迁移理论(即迁移动机和迁移决策理论)及迁移选择性理论和迁移后果研究(李竞能,1992)。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运用以下三个相应于本文的迁移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及累积效应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Massey,1993;Massey,1990;Myrdal,1957;Taylor,1986),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的解释作一简单的分析。

为世人所公认的能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作出较好解释的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迁移的成本—效益理论(或推—拉理论)的框架之中,以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托达罗认为,决定农村潜在迁移者是否迁移的根本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与效益的权衡,即预期收入。这种预期收入是城市实际工资收入与就业机会的乘积与农村实际收入之差。但此处必需明确,这里所说的城市中的就业机会是指何种就业机会?是指进入城市的传统部门就业的机会,还是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机会?如果是指后者,那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人们所能预期的收入只能是较低的,甚至于可能低于农村的实际收入。但如果是指进入传统部门就业的话,由于竞争性减弱,传统部门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而使预期收入相对得到提高,从而更刺激了农村中潜在的迁移人口继续进入城市,而使迁移流得以持续。因此,我们在考虑农村人口进城的动机时,不能只考虑按模型中所能计算得到的预期收入,而必须更广泛地考虑诸如城镇中传统部门的规模及其就业机会,劳动力的迁移规模及速度,乃至城市劳动力的职业分布等因素。

其实,农村人口在决定进城时,总是带着一定风险性的。他们对于城镇中的实际收入、就业状况等有关信息更多的是通过在外工作的亲朋好友等返乡时的交谈得到,而并非在自己真正掌握完全的信息的情况下作出迁移决定的。同时,在到达迁入地后,通过亲友、同乡等关系建立的这种劳动群体——“网络”为后来的迁入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同时,随着这种网络的不断扩大而使迁移的费用与风险得到持续降低。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对“人情”相当注重,而且目前的部分事实也证实,在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在迁入地形成的这种“网络”对于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仍具有相当强的作用。笔者认为尽管这种“网络”理论本来是对国际迁移的一种解释,但对于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这种“网络”是由迁出地人口在迁入地形成的一种移民文化。累积效应理论认为,当迁移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对迁出地而言,它可能会改变这个地区人们的价值观与文化观,从而刺激新的迁移的形成;而对于迁入地而言,则出现了目前社会上通常所说的“打工”阶层,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是托达罗所称的传统部门,它

们通常处于职业等级的最低层。因此一旦在某个行业中集聚了较多的迁入者,那么这个行业就会被打上“移民工作”的社会标识,从而使许多本地劳工将其视为在文化上不适合的工作而愿意从事。而这种现象正是目前城镇失业人口在就业观念上的一个主要障碍。

通过运用三种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对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进行简单分析后发现:(1)尽管托达罗模型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乡—城迁移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我们在运用它来分析问题时,应该注意到其中所用的模型参数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运用西方其它人口迁移模型时所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2)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对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进行剖析的话,我们的解释可能会比利用比较利益来分析具有更佳的效果!

4 结 语

本文仅是对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的形成、持续原因及西方迁移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作了简单的分析,所得的结论是:

(1)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不论是从农村的角度,还是从城镇的角度,都有其必然性;(2)但在城镇中具有较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继续迁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产业间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3)这种迁移流所以持续不断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则来自于城镇:城镇人口与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之间在就业上由于就业观念和期望利益不同而不存在竞争性,以及由农村迁出的人口在迁入地形成的以血缘、地缘及人缘为纽带的务工群体——社会网络!(4)在注意西方人口迁移模型的参数适用性的同时,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从文化(观念)角度来对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进行剖析,以期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当前乡—城人口迁移的形成及持续原因!

参考文献:

- 1 马侠.《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 2 冀党生.邵秦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1995
- 3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 4 李荣时.(a)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认识和思考.人口研究.1996年第1期
(b)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再认识.人口研究.1996年第6期
- 5 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1996年第4期
- 6 郭书田.“民工潮”——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分析.冀党生,邵秦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1995
- 7 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人口就业预测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6期
- 8 农业部《“民工潮”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经济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情况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 9 程啸.我国失业统计指标的主要缺陷及其完善.人口研究.1997年第5期
- 10 蔡昉.城乡劳动者就业竞争:替代抑或互补?(人口与发展论坛).人口研究.1997年第4期
- 11 李竞能.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12 Douglas S. Massey,“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No. 3, 1993
- 13 Douglas S. Massey,“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 1990
- 14 Gunnar Myrdal, 1957, Rich Lands and Poo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5 Taylor 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Re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